

文炼胡附 语言学论文集

WENLIAN HUFU
YUYANXUE LUNWENJI

文炼
胡附
著



商务印书馆

文 炼 胡 附 著

商 務 印 書 館

2010 年 ·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炼胡附语言学论文集/文炼,胡附著.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ISBN 978-7-100-07149-9

I. 文… II. ①文… ②胡… III. 语言学—文集
IV. H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86698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WÉNLIÀN HÚFÙ YŪYÁN XUÉ LÙNWÉNJÍ

文炼胡附语言学论文集

文炼 胡附 著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ISBN 978-7-100-07149-9

2010年11月第1版

开本 850×1168 1/32

2010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13 1/4

定价: 29.00 元

继承、吸收和发展(代序)

张 斌

语言学是一门科学,而且是一门领先的科学。“科学”这一术语是“五四”以后才通行的,我们的祖宗称之为“真知灼见”。

人们常说“实践出真知”,这是一个简化了的命题,很容易使人误解。实践是出真知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我们只能理解为“实践才能出真知”,不能理解为“实践就能出真知”。

怎样的实践才能出真知?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要善于观察,一种意见认为要善于从实践中提出问题。善于观察指发现事物间的种种联系,从而归纳出一些见解和规律。“月晕而风,础润而雨”,这是观察的结果。可是有些学者不这么看。有个叫波普的哲学家做了一次实验。在一次讲演时,突然说:“请大家观察,仔细地观察!”大家感到莫名其妙,于是问他要观察什么。他于是说,任何人总要带着问题去观察。没有问题,观察就失去意义。

从观察中找寻规律,这是归纳的过程。提出问题总是在某种前提下产生疑问,希望从已知到未知,未知有了答案才能满足。这就包含了演绎。在科学上,归纳与演绎总是交织在一起的。

前人在观察的基础上总结出规律,我们在吸收的同时要善于提出问题,例如王力先生曾研究汉语中的系词,以“是”为代表。1940年出版的《中国语法学初探》中说:“是字当做系词用,乃是六

朝以后的事情。”这一结论一直为学者们所接受，即认为“是”在上古时代只作指代词。王力观察了大量语料，立论是有根据的。可是我们从出土的马王堆帛书中发现连用两个“是”的句子，如“是是彗星”之类。这只能解释为前边的“是”训“此”，后边的“是”属系词。这就使人们怀疑系词产生于六朝的说法。不过，话又说回来，“例不十，法不立”，我们还得找寻更多的资料。也就是说，提出了问题，还须进一步观察。

吕叔湘先生曾一再强调务实，这是针对空谈理论而不进行实际观察的现象而说的。我们在强调注重语言事实的同时，也应该看到完全的归纳是很难做到的。正因为如此，我们应当经常对现成的规律加以补充或修正。例如现有的词类是不完全归纳的结果，所以不能把所有的词都包括在内。

吸收国外的成果包括两种内容：一是国外研究汉语的成果，一是国外研究语言的理论和方法。

汉语作为使用人口多、历史悠久的语言，已成为世界性的研究对象。外国学者对汉语的研究有超过中国学者的。例如瑞典汉学家高本汉构拟汉语的中古音和研究上古音系统，他的学说促使我国音韵学走向现代化。我国学者在肯定他的成果的同时，也作了补充和修正。

国外有许多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大都是研究国外的语言的结果。拿来运用于汉语，还须经过筛选、调试。

有些理论是一种假说。许多假说都有它的核心部分和周边部分。核心部分不切实际，那么这种假说不能成立；核心部分成立，周边部分可以根据不同情况加以更改，不影响假说的利用。我们运用国外的学说研究汉语，主要是把握该学说的核心，周边部分总须改进，以适合我们的具体情况。国外的学说在不断改进，我们不能老是依样画葫芦。应该研究各种理论和方法形成的

基础,适用的范围,具体操作时发现的问题,然后用汉语来检验。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出现之后,说明牛顿的理论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是,在一定的范围内,牛顿的理论还是适用的。古代的理论也好,外国的理论也好,总是在不断发展。新的学说的出现,并不一定全面推翻旧的理论,关键在注重规律的适用条件。

我们的语言研究的目标是规范化和现代化。“规范化”这一目标隐含着一种哲学思想:存在的并非都是合理的。如果存在的都是合理的,那就用不着提倡规范化了。因此研究存在的语言现象哪些是合理的,哪些是不合理的已成为语言学家的任务。语言学家没有资格揣着红牌和黄牌向言语行为不当的人作出警告,但是应该在舆论上尽自己的责任,引导人们向前看,能摆正普通话和方言的位置,特别是要理解语言规范化和语言研究现代化的关系。

1956年我国已经把机器翻译列入国家科学研究工作的项目,“文革”期间,研究中断。70年代末引入了计算语言学的新理论,在理论和实践上进行了探索。80年代工作进展很快,机器翻译、人机对话迈向了实用化新阶段,在各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绩。目前正在扩大研究范围、制订长远规划,以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

在这迅猛发展的阶段,考虑一番继承和吸收方面的问题看来是必要的。

(原载《语文论丛》(七),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

南国双星 闪耀语坛

——张斌胡裕树先生的学术思想、风格和友谊

范开泰

二十多年来，经常有学界朋友跟我谈起张斌和胡裕树先生，对他们的学术成就和真挚友谊深表敬佩，希望我能把我跟从先生们学习研究的心得体会写出来与学界同仁共享。

观诸当代学界，许多前辈，风范高致，令人崇敬；不少时贤，才思横溢，令人钦佩。但是，像张胡两位那样近半个世纪的和谐合作，创新精进，使人仰慕的，却也鲜见。我在国外时听到一种说法，常令我汗颜：三个日本人怕一个中国人，三个中国人怕一个日本人。这当然不完全合乎实际。但是有一件事却令人深思。1965年我国科学家首次人工合成牛胰岛素，举世瞩目，国际上许多著名科学家都认为应该得诺贝尔奖，诺贝尔奖评奖委员会要中国申报。诺贝尔奖规定，一项成果获奖者以三人为限。名单排来排去，怎么也“摆不平”，最后申报了四人，结果因为违反了章程，失去了一次通向斯德哥尔摩领奖台的良机，令国人抱憾至今。想到这里，我感到更有责任把两位先生的思想、风格和友谊写出来，让他们的崇高精神发扬光大。

—

经常有人谈起现代汉语语言学中的“京派”和“海派”。这种

说法,张胡先生似乎不甚同意。张斌先生曾有文章说:“陈望道先生和方光焘先生在学术上都重视吸收现代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有人称之为‘海派’。北方一些专家如吕叔湘先生一再强调‘务实’,有人称之为‘京派’。胡裕树认为这是误解。陈先生和方先生讲到理论和方法时,总是强调要结合汉语实际。吕先生提倡务实,是针对空谈理论的弊病而言。胡裕树主编《现代汉语》教材时,多次写信向吕先生请教。把胡裕树称作海派或京派,看来都不合适。”^①这一点上,我跟两位老师的意见有一点小小的不同。海派京派,如果指学界的圈子,看一看被视为两代“京派”代表的吕叔湘朱德熙先生跟两代“海派”代表的陈望道方光焘和张斌胡裕树先生的学术交往和学术交谊就可知道此言不确了,“君子群而不党”;如果是指学术思想和风格,指学术研究上的侧重点,那还是有些特点的,“和而不同”,古亦有训。

两位先生的学术思想特点,可以用“注重理论方法,积极开拓创新”十二个字来概括。具体地说,对具有革新意义的新理论的理解和吸收,抓住本质,力求通透;积极地试用新的方法来分析汉语,具体而微;结合汉语的特点进行理论和方法上的探讨和创新,锲而不舍。

20世纪30年代,陈望道方光焘先生在上海发起“中国文法革新讨论”,把索绪尔的结构语言学理论和方法引进了汉语语言学界。五十年代张斌胡裕树先生联手参加汉语词类问题大讨论,《谈词的分类》一文明确地提出词分类的功能标准,引起了国内外汉语学界的高度重视,当时苏联的语言学界还全文翻译发表了这篇论文,正在于张胡这两位当时的青年学者表现出理论上的鲜明和分析上的通透。这篇论文的观点受到方光焘先生的“广义形

① 张斌《缅怀裕树》,见《语言文字周报》第941期,2002年3月6日。

态”说和陈望道先生的“功能”说的影响是十分明显的。

“词的分类标准”所引发的汉语语法分析问题始终是两位先生研究的重点。50年代,苏联语言学界有一种说法,认为词类是“词汇·语法范畴”。当时有些中国的学者借来用到汉语的词分类问题上,把区分词类的标准定为“词汇·语法范畴”,具体操作上就体现为双重标准,即词义与功能并列。张胡先生指出:苏联认为词类是“词汇·语法范畴”,目的在说明词类的性质,并非指明区分词类的标准。俄语的词类区分凭的是形态,并不须另立标准。

意义不能作为词类区分的标准,词分类的标准只能是功能,句法功能,当这一点已经成为大多数学者的共识时,张胡先生又进一步思考词类与意义有没有关系。说毫无关系,不能令人信服。他们提出了意义是词分类的依据(或称之为基础),功能是标准的观点。后来张斌先生又进一步把基础和标准的区分提到方法论原则上来思考,“无论如何,语法上的分类不能把依据和标准混为一谈”,^①这种区别适用于语法分析的许多方面,例如:句类,用途或目的是基础,由语调、虚词、句式等表示的语气才是标准,否则就难以解释用疑问句表示祈使等现象了;词的切分,“口语是基础,书面语的分词书写才是标准”。^②

胡裕树先生主编的全国统编教材《现代汉语》,其核心部分“语法”是由张斌先生执笔的。这部教材,可以看作是两位先生把语法研究的新的成果运用和体现到大学语法教学中去的努力。60年代到80年代,教材中推出了区分句子结构和句法结构,区分

① 张斌《〈语气和口气研究〉序》,见孙汝建《语气和口气研究》,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年。

② 张斌《我的语法观》,见《语言问题再认识》,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

句型、句类和句式,在句型分析中修饰成分不影响句型,区分意义和内容,区分语气和口气,以及后来总结的三个平面的分析等等一系列的汉语语法分析方法,在大学汉语语法教学中不间断地领着学术风气之先。他们在《中国语文》上随之发表的一系列语法论文,在汉语语法理论的发展史上更有深远的影响。

二

上一节,我说到不妨把注重理论分析上的思考看成是“海派”学术风格,“这一点上,我跟两位老师的意见有一点小小的不同”。有些朋友可能认为,我这个学生在为老师的选集作序时这种口气未免太“不敬”了。其实,这正是两位先生的典型的学术风格。

张胡先生对前辈学者非常尊敬,他们认为陈望道方光焘先生在引进索绪尔的结构主义理论和方法时,结合汉语作了许多研究和思考,但是学习继承要着眼于发展,不仅要踵武前贤,更要踵事增华。前辈学者中,两位先生对吕叔湘先生特别敬重,用两位先生自己的话说:“在我们的研究中不断得到吕先生的指导。”例如提出区分语气和口气,描写和分析语气词的叠用现象,确定“生于××年”之类结构是动介短语带宾语,等等,都得到了吕先生明确而热情的肯定和支持。两位先生和林祥楣先生一起担任《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卷》的“汉语语法修辞分支学科”主编副主编任务时,更得到了吕叔湘先生具体而微的指导。

张胡先生对同辈学者友情甚笃,这是学者间的情谊。他们在推广层次分析,提倡三个平面分析等理论方法上,跟朱德熙、胡明扬等学者引为同道,又在“名词性状语”等问题上跟朱德熙先生有过争论。正是在这种高层次学者的学术争论中,或者取得了共识,或者有了各自更深层次上的学术收益。

对待后辈学子，先生们更是关爱备至。我 1981 年到美国去进修现代语言学理论，先生们谆谆嘱咐“要把理论学通，用到汉语研究上来。记住，你是要回来搞汉语语法研究的”。此情此景，终身难忘；至理哲言，一生受益。对于学术见解，先生们又是鼓励后辈大胆创新，勇于争论。记得 80 年代我在华东师大任教时，曾多次随林祥楣先生去参加先生们的学术聚会，他们总是鼓励我勇于发表自己的意见。先生们自己也是身体力行，总是坦率地把学术观点陈述透彻，不怕争论，“有时争得脸红耳赤”。^①

认真执著的钻研精神，坦荡的学术心胸，反复辩难的研究方法，往往最能得到学术创新的丰硕成果。

吕叔湘先生曾经讲过一个观点，汉语语法研究，主要是“别同异，辨正误”。别同异是语法分析，辨正误是语法应用。张胡两位先生坚持用从形式到意义的研究方法，在汉语语法的微观研究上也有很多创新性的发现。例如，用介词短语的自由和黏着来鉴别动词和介词。“他在家读书”是连动，“他在明天动身”是介词短语作状语（介词短语后边的动词不可少）。例如，用后面的短语能不能提到前面去——话题化，来鉴别动词和助动词。“他会日语”、“他会说日语”中的“会”都是动词，动词后面的词语是宾语，能提前；“天会下雨”中的“会”是助动词，后面的“下雨”不是宾语，不能提前。又如说到兼类，有人认为兼类是一个词具有甲类和乙类的功能，张先生指出这种说法嫌笼统。例如“喜欢”，可以带宾语，同时可以加“很”，如“很喜欢读书”。有些词具有甲类词的特点时，排斥乙类词的特点；具有乙类词的特点时，排斥甲类词的特点。如“方便”，我们可以说“方便群众生活”，也可以说“很方便”，但不能说“很方便群众生活”。只有后一种情况，才能看作兼类。

^① 见《中国社会科学家自述》，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 年。

近年来,张斌先生在运用信息论的观点研究汉语语法,又提出了不少很有启发性的论点。包括信息解码的问题(研究句内的表达因素,着重分析句子的理解策略,强调区分形式、意义和内容,着重分析预设;研究句外的表达因素,着重区分前提与预设);信息噪声问题(分析歧义的种种表现及消除歧义的方法);信息类别的问题(指称问题等等);信息量的问题(从信息量的角度解释句子能不能成立的原因),等等。张斌先生对于汉语节奏的分析研究,为结合语音特点研究语句和语篇结构开辟了一个新的局面。

“海纳百川”,加上“锐意创新”,这就是两位先生学术风格的特点。

三

“嘤其鸣矣,求其友声”,高山流水,必融神会。两位先生半个世纪的学术友谊,扎根于理论上的共识和志趣理念上的共鸣,也得益于学术性情上的刚柔相济,互相适应,行事方式上的互相配合、相得益彰。

两位在学术上眼界开阔,思路清晰。但是学术个性还是有些不同。用胡先生的话说:“拿写作习惯来说吧,他(按:指张斌先生)的习惯是有了一些看法,先写下来再慢慢改,我的习惯是考虑得比较成熟再动笔。”^①张斌先生博览群书,涉猎甚广,最善于吸收外来新知,提出研究新路子,他们共同研究的许多课题,往往是张斌先生率先提出的,例如从符号论的理论和方法,提出三个平面的分析思路,从信息论的原理,提出跟语法结构有关的一系列信

① 张斌《胡裕树的几件小事》,见《咬文嚼字》2002年第2期。

息处理的要素,从逻辑学的分析提出复句分类的三类因素,从心理学的角度提出语言理解的策略,等等。胡裕树先生长于综合与慎思,善于把新的理论与方法跟传统的研究成果结合起来,进行系统的思考处理。经过两位精细的、透彻的反复推敲,最后提出来的观点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是共同创造的精品了。

张斌先生在追忆挚友胡裕树先生时提到胡先生对自己笔名的解释:“胡是胡椒,附是附子,这是两味温热药。我的习性偏于寒凉,宜补以温热。”还提到胡先生对张先生的建议“你的笔名最好用两味寒凉药”。张斌先生深有感触地说:“中国医药常常以温热补寒凉,这种互补,大概是我和他长期合作的基础吧。”哲人斯言,大有深意。同气相求、珠联璧合的结果恰恰是从刚柔相济、温寒互补的过程中得来的呀。

两位先生在学术研究上锐意精进,在人生态度上却是谦和逊让。他们合作的第一部专著《现代汉语语法探索》,署名胡附文炼,第二部著作《汉语语法研究》,署名张斌胡裕树,他们的两本学术论著选,又是胡裕树张斌,张斌胡裕树。这不是简单的平衡,实在是互敬互让、携手共进的象征啊。

目 录

(一) 方法论

我的语法观	2
汉语语法研究刍议	8
我对 40 年来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的一些看法	16
论语法学中“形式和意义相结合”的原则	28
与语言符号有关的问题	
——兼论语法分析中的三个平面	39
关于句子的意义和内容	50
汉语语序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55
划分与切分	64
关于分类的依据和标准	69
词语之间的搭配关系	
——语法札记	78
谈谈汉语语法结构的功能解释	89
语法分析的心理学基础	98
句子的解释因素	104
句子种种	
——谈谈句子和语境的关系	116
蕴涵、预设与句子的理解	121

指称与析句问题	129
句子的理解策略	136
谈谈句子的信息量	145
句子的理解与信息分析	151
从符号学的观点考察汉字	160

(二) 词法

词的范围、形态、功能	166
谈词的分类	179
关于词类问题的思考	196
词类划分中的几个问题	205
名词和名词单位的特征及其功能	214
“会”的兼类问题	222
关于“有”的思考	226
《现代汉语虚词研究丛书》总序	230
“在”、“于”和“在于” ——读《马氏文通》一得	233
从“吗”和“呢”的用法谈到问句的疑问点	235
关于象声词的一点思考	240
固定短语和类固定短语	242
关于词典标明词性的问题	247

(三) 句法

谈词语的并列	254
句子分析漫谈	258
有关句子分析的几个问题	271
谈谈句法分析和句子分析	282

如何确定句型	288
试论汉语句首的名词性成分	295
谈宾语	305

(四) 语法和语法教学

汉语语法	314
从“们”字谈到汉语语法的特点	335
语言单位的对立和不对称现象	342
《现代汉语》使用说明(语法部分)	349
语法教学 40 年	363

(五) 节律问题

汉语语句的节律问题	372
格律诗语言分析三题	380
从语言结构谈近体诗的理解和欣赏	390
试论对汉语格律诗的理解	399

(六) 其他

《马氏文通》关于虚词的研究给我们的启示	408
读《马氏文通》偶记	413
外语教学的心理学基础	422

(一) 方 法 论